臺大歷史學報第27期
2001年6月，頁151~185

BIBLID1012-8514(2001)27p.151~185

蕭公權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

黃俊傑*

提　要

本文主旨在於探討蕭公權（1897~1981）所撰《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之內容、方法及其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上之重要性。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說明本文寫作用意，第二節說明蕭公權寫作《中國政治思想史》這部鉅著的教學背景及準備工作，在第三節介紹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特質與分期之看法，第四節則在中西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脈絡中，考察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定位。第五節則綜合全文，提出結論性看法。

根據本文的分析，蕭公權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史，首先指出中國政治思想之特質在於重實際，多因襲。蕭公權之方法論特重將政治思想置於歷史背景中考察，因此，他對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方式，特別從政治思想之演進及其歷史背景著眼。本文第四節將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置於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論著的脈絡中加以考察。蕭氏書稿完成於一九四〇年抗戰時期的四川，一九四五年在上海正式出版。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其資料之全面性以及論述之系統性，而與一九四五年以前所出版之各種有關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顯著之差異。蕭著出版後，在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期、研究的方法，乃至特定論點上，對於以後出版之著作均有影響。蕭著與同時代西洋政治思想史論著，頗可互相呼應。從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歐美政治學界關於政治思想方法論之爭論來看，蕭著的方法論傾向有待深入考量。本文第五節提出結論，指出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展現某種「脈絡主義」的方法論傾向，與一九六〇年代以降歐美政治學者如波卡克與史基納的研究方法，頗有神似之處。但是，蕭公權並不因其方法論傾向，而將價值問題從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完全抽離。通貫蕭公權的所有著作，價值關懷仍是蕭公權學術世界中的核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蕭先生不僅是一個文化的折衷主義者，也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折衷主義者。

關鍵詞：蕭公權　中國政治思想史　脈絡主義　折衷主義

---

* 作者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引言
二、《中國政治思想史》撰寫前的預備工作
三、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特質及其發展的定論
四、從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脈絡看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
五、結論

一、引言

蕭公權（迹園，1897.11.29~1981.11.4）先生是二十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巨擘，著述宏富，在思想史、社會史、近代史等各個學術領域，均有重要論著發表。[1]本文主要討論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並將其政治思想史研究業績，置於中西政治思想史學界的學術脈絡中加以衡量，並加以定位。

蕭公權一生任教於國內外大學，裁成弟子甚多，在人文學術研究上也獲得了世界學壇一致的推崇。他的一生可以很明確地劃分為兩個時期：（一）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到民國十五年（1926）是蕭公權的學生時代。在這二十四年中，他從家鄉私塾舊式教育開始，直到青年會中學、清華學校、美國密蘇里大學，以至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完成博士學位。在蕭公權學思歷程中，清華人文教育對他影響深遠。[2]這一段時間在中西新舊學問之間的涵詠培育，奠定了他畢生治學的紮實基礎，也是他教育事業的內在能源。（二）從民國十五年（1926）到民國五十七年（1968）是蕭公權的教學時代。在這四十二年之中，先後或同時任教於國內十二所大學：國民、南方、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北京、四川、

1 蕭公權先生著作目錄，另詳本文附錄。

2 關於清華大學人文教育傳統，參考蘇雲峰，〈清華的人文教育傳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0 期（1991 年 6 月，臺北），131~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光華、華西、政治、臺灣等大學，以及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民國七十一年（1982）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時，蕭公權以心臟病仙逝於西雅圖寓所。[3]

本文將在第二節說明蕭公權寫作《中國政治思想史》這部鉅著的教學背景及準備工作，在第三節介紹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特質與分期之看法，第四節則在中西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脈絡中，考察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定位。第五節則綜合全文，提出結論性看法。

二、《中國政治思想史》撰寫前的預備工作

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這部巨著，約七十萬字，完成於一九四〇年夏季抗戰時期的四川成都；五年之後，在一九四五年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出版以後，頗獲學界重視，史學界前輩繆鳳林先生在出版前審查此書時就推許備至。一九五八年，蕭公權早年的弟子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牟復禮（F. W. Mote）開始譯此書為英文，首卷於一九七八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4]第一冊英譯本只譯第一至十一章。《中國政治思想史》這部書的實際撰寫雖然僅費時二年（1938~1940），[5]但是在執筆前卻有長期的準備工作：（2：1）首先是蕭公權問學北美時接受

3 以上有關蕭公權一生行誼階段，根據蕭公權回憶錄加以歸納，參考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另詳黃俊傑，〈蕭公權與中國近代人文學術〉，收入拙著，《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1986），109~148。關於蕭公權學術與行誼，參考《蕭公權與中國近代學術——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99次學術討論會紀錄》（臺北：國史館，1984年8月）所收各家之文章或演講；汪榮祖、〈傳世詩文盡雅言——蕭公權先生的生平與學術〉，《中國文化》第6期（1992年9月，臺北），199~202；汪榮祖，〈蕭公權先生小傳〉，收入劉夢溪主編，《蕭公權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3。

4 書名是 Kung-ch'üan Hsiao, tr. by F. W. Mote,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I: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Sixth Century A.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5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127~1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嚴謹的政治哲學訓練，以及（2：2）一九二七年返國後長期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與「西洋政治思想史」課程的教學經驗，以及編纂《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輯要》，作為撰寫之基礎資料。

（2：1）問學北美

蕭公權於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先後完成學士及碩士學位，在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佘賓（George H. Sabine）引導之下，以英國學者拉斯基（Harold J. Laski, 1893~1950）所提出的多元政治理論作為主題。誠如汪榮祖所說，佘賓教授「後來於1937年完成《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一書，名噪一時，而三年之後蕭公權也完成《中國政治思想史》，師弟東西輝映，而二書皆成經典之作，可稱美談」。[6]一九二三年六月蕭公權在密蘇里獲碩士學位之後，接受佘賓教授建議前往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7]

蕭公權在康乃爾大學三年（1923~1926）受教於狄理門下，一九二六年提出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分析近代西方政治思潮，於一九二七年在倫敦出版，[8]並列入「當代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方法叢書」（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h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牛津大學曾指定為「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之一。

北美問學的六年（1920~1926），使蕭公權嫻熟西洋政治哲學傳統，成為他將來治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術資產。舉例言之，蕭公權批評馬克斯，[9]比較邊沁與墨子政治思想，指出邊沁認為「功利」乃左右人類行為之動力，而功利之運用則有賴於政治、道德、宗教等因素的制裁。墨

6 汪榮祖，〈增訂版弁言〉，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1983），頁（六）。

7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49。

8 Kung-ch'üan Hsiao, *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27).

9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之政治思想既以利害為起點，亦立為尚同、天志、明鬼諸義，以保障兼愛之施行。「尚同」可視為墨子思想中之政治制裁，而「天志」、「明鬼」則為其宗教制裁。[10]他同意馮友蘭所說墨子與霍布士思想相近之說，但又指出霍布士否認神權，而採用民約，墨子則承認天志而未有民約之觀念。[11]他比較莊子與歐洲自由主義者之異同，認為約翰穆勒之鼓吹自由，即以發展個人之智能為一重要之根據。老莊則堅持人類天然本性可貴，而反對一切後天之培養發展。歐洲自由主義者欲政府「為道日損」，以謀個人之「為學日益」。老莊則教個人以去智寡欲，求自得而不求自進，與君長各相契於損道。故在宥之術，無須「民智」，不待平等。[12]他將老莊與希臘西閏學派、伊比鳩魯學派、犬儒學派比而觀之，指出莊子與Max Stirne思想之相似性。[13]他又比較管子與西洋中古世紀政治思想、英國憲法，[14]比較法家與柏拉圖，[15]比較韓非與馬基維利，[16]比較章太炎與潘恩（Thomas Paine）。[17]凡此種種都顯示蕭公權北美問學六載，奠定紮實的西洋政治哲學基礎，使他日後治中國思想史可以出入中西，別出新見。誠如汪榮祖所說：[18]

> 中國政治思想史一題為西洋體裁，不見於傳統的著作之林，故作者必須自闢蹊徑。然若要開出康莊大道，不入歧途，則必須於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所涉獵，以及於政治思想一概念有明確的認識。

汪榮祖這一段話確實道出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之所以在同類著作中出類拔萃的主要原因。

---

10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141。
1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166註45。
1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192。
1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203註118。
1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231~232註73~78。
1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262。
16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268註37、269註48。
1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927。
18 汪榮祖，〈增訂版弁言〉，《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頁（五）~（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2）返國任教與編輯《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輯要》

蕭公權在完成博士學位返國任教之前，就已立定志向以他在國外所接受的治學訓練為基礎，專治中國政治思想史，他說：[19]

> 我出國以前讀過一些中國書，也得到一點實際生活的親身體會。由此我得到一個認識：中國文化當中固然有不合時，不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若干觀念仍然有現代的意義。例如「民惟邦本」，「天視自我民視」，「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乃至「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遂」等，在今日任何「文明的社會」裡可以適用。根據這認識，我立了一個志願：我今後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點訓練，所得的一點知識，去從長研究中國文化。我在美國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國後的主要工作當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蕭公權在民國十五（1926）年八月返國抵達上海，民國十六（1927）年二月起，開始在天津的南開大學任教，講授「政治學概論」、「比較政府」、「法理學」，第二年起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和「社會演化論」。此後，在瀋陽的東北大學（1929~1930）、北平的燕京大學（1930~1931）及清華大學（1931~1937）、北京大學（兼課），成都的四川大學（1937~1939）、華西大學、光華大學等校，所開課程都以「中國政治思想史」及「西洋政治思想史」為主。[20]以上豐富的教育經驗以及留學北美所接受的學術訓練，是蕭公權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重要預備工作。

蕭公權任教清華大學（1932年9月至1937年7月）五年期間，講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為了「中國政治思想史」授課之方便，「從許多舊籍裡摘選了有關的資料，請人抄出，印成『講義』，隨堂發給他們。……可惜抄錄和排印的進度都頗遲緩。清代的資料，抄寫未竟，七七變起，無法繼續完成。所幸已經印成從先秦到明末總共一千四百多面的資料，我存留一份，給我後來《中國政治思想史》

19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70。

20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89、94、97、101、123、125、1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撰寫不少方便」。[21]這一批史料選編，是蕭公權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最重要的參考。蕭公權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秋至二十九年（1940）夏兩年之間，在四川峨嵋西郊完成《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撰寫，他說：[22]

> 我在農家寄居兩年，完成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撰寫。我在清華任教時所編的參考資料和我歷年授課所用的教材，全部帶到了成都。我在城內川大任教時又從圖書館所藏的中國舊籍中搜集了一點補充資料。現在利用鄉間的安靜環境，著手寫一部適合大學生和一般讀者參考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坊間雖然已經出版了兩三部《中國政治思想史》，我相信還有餘地寫一部根據政治學觀點，參酌歷史學方法，充分運用原始資料，儘量避免臆說曲解的書。每天晚飯已畢，稍事休息之後，我便獨坐書齋，在燈下構思走筆，日復一日，很少間斷。到了二十九年夏天，全書脫稿，償了懷抱十幾年的夙願。

作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預備工作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輯要》，選錄自先秦至清末諸家之著述。「選錄之標準有二：一曰盡量收錄有理論價值之文獻，二曰酌量收錄有歷史價值之文獻。其純乎針對一時一地實際問題而發之政論則不選入」，[23]蕭公權進一步解釋選材之標準說：[24]

> 編中次序以年代之先後為準。其中偶有例外，則以參考之便利為斷。全書為章凡五十三，為附錄凡三十一。各章所錄，以人為主。其標準為：（一）一家之言。（二）影響重大之著述。其思想相近，時代相及而文獻不豐者，則仿史書合傳之例，酌併於一章之中，藉便比觀，且省篇幅。附錄所收者為：（一）不合上述標準而足資參考之述作；（二）雖合上述標準而文獻過於簡短或殘缺者；（三）真偽未定之書。

---

21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101~102。

22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127。

2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附錄：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輯要凡例〉，941。

2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942。這套資料選輯並未正式出版，當年印製作為講義之原本，現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各收藏乙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述選編政治思想史基本史料之原則亦通貫於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之中，蕭公權解釋《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寫作凡例有云：「本書體例以時代為經，以思想派別為緯，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論價值者為主。影響較大之政論亦酌量述及，專對一時一地實際問題之政論則一概從略。」[25]這項原則是蕭公權選取史料並從事政治思想史的撰述的基本準則。

三、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特質及其發展的定論

蕭公權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史，（3：1）首先指出中國政治思想之特質在於重實際，多因襲。（3：2）蕭公權之方法論特重將政治思想置於歷史背景中考察，（3：3）因此，他對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方式，特別從政治思想之演進及其歷史背景著眼。謹闡釋以上三項命題如下：

（3：1）中國政治思想的特質

蕭公權指出，中國政治思想有兩項顯著特點，第一是重實際而不尚玄理。他認為：[26]

> 中國學術，本於致用。致知者以求真理為目的，無論其取術為歸納、為演繹、為分析、為綜合，其立說必以不矛盾，成系統為依歸。推之至極，乃能不拘牽於一時一地之實用，而建立普遍通達之原理。致用者以實行為目的，故每不措意於抽象之理論，思想之方法，議論之從違，概念之同異。意有所得，著之於言，不必有論證，不求成系統。是非得失之判決，只在理論之可否設張施行。荀子所謂『學至於行而止』，王陽明所謂『行是知之成』者，雖略近西洋實驗主

2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凡例〉，頁（十）。

26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附錄：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9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義之標準，而最足以表現中國傳統之學術精神。故二千餘年之政治文獻，十之八九皆論治術。其涉及原理，作純科學、純哲學之探討者，殆不過十之一二。就其大體言之，中國政治思想屬於政術（Politik; Art of Politics）之範圍者多，屬於政理（Staatslehre;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之範圍者少。

第二項特質是多因襲而少創造。蕭公權認為，中國之政治體制除了商周之交與周秦之際，曾有部落變為封建以及分割歸於統一之重大變遷以外，由秦漢至明清二千餘年之中，君統無改，社會少變。環境既趨固定，思想自多因襲。必至海通以後，外患與西學相繼侵入，然後社會騷然，人心搖動，激成清季思想空前之轉變。他進一步指出：[27]

> 中國之君主政體，秦漢發端，明清結束，故二千餘年之政論，大體以君道為中心。專制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然而二十餘朝君主之中，能實行孔墨以來所發明之治術者，實無多人。正確之學說以未行而保持其信仰，錯誤之理論亦以未試而得隱其弊謬。修改思想之必要因此減少，崇古守舊之習慣隨以養成。

（3：2）在歷史脈絡中分析政治思想

蕭公權分析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論傾向是：扣緊歷史背景分析政治思想之針對性及其內涵。他強調：「任何政治思想家必有其時代之背景，亦必有其思想上之背景」，[28]認為：[29]

> 一種政治學說是否包含真理，可以從兩方面去判斷。第一、人類的思想，尤其是社會和政治思想，不能離開歷史環境而發生。因此衡量一種學說是否真確，便可依照其是否能切合一個時代的需要，或反映一個時代的實況而斷定。第二、思想雖然不能完全脫離環境，偉大的思想家卻能夠不受時代的限制，在當前的環境裏面發現人生

2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947。

28 蕭公權，〈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收入氏著，《迹園文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3~20，引文見頁3。

29 蕭公權，〈孔子政治學說的現代意義〉，收入氏著，《迹園文錄》，56~74，引文見頁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社會的基本原理。

他又說：「政治思想雖不能離環境以產生，而在同一歷史環境中，所有思想之內容不必皆出一轍。個人之品性，家庭之生活，師友之影響，凡此一切均可使個人對於同一環境發生不同之反應而促成其思想之分歧。」[30]這種看法是他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立場與方法。

蕭公權從這種方法論立場出發，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發展，特重政治思想與歷史情境之互動關係。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明，[31]蕭公權論述先秦政治思想之發展，對於先秦諸子各家各派思想之交互影響付予高度的注意，其理由乃在於「先秦學說既產生於大體相近之歷史環境中，各派之間豈能避免交互之影響。」[32]他根據這個理由，指出，墨子曾受儒家之影響，法家思想一部份殆由儒學蛻變而來，法家亦受道家影響，而道家與墨家殆亦相通。[33]在先秦孔門之內，孟荀俱傳孔子之學，以其所處之歷史環境與仲尼不同，故其思想之內容亦略有變異。[34]荀子之尊君態度則為專制天下前夕歷史背景之反映。[35]孔墨不同道，然二者行跡實有相似之處，此因孔墨之歷史時代及政治環境大體相同，故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學乃平民化之孔學。[36]蕭公權也根據同樣觀點認為，韓非為法家之殿軍，而實集前人之大成。法家思想中「法」、「術」、「勢」三個主要觀念，皆為歷史環境之產物，孕育長養，至韓非而達其最後成熟之型態。孕育滋養此諸觀念之歷史環境，一言以蔽之，即封建天下崩潰過程中之種種社會政治事實而已。[37]

蕭公權亦以歷史背景之轉變，解釋秦漢以下政治思想史之發展。在

30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175。
31 黃俊傑，〈蕭公權先生與中國近代學術〉。
3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35。
3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35。
3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91。
3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108。
36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136。
3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2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秦漢思想史上，墨學之消沉為一大因緣，歷來思想史家說法不一，民國初年學界對此一史實之原因的爭論尤其激烈。蕭公權認為，墨家衰亡之最大原因，在於環境之改變，而墨徒不能修改師說以適應之。秦始皇統一天下，封建為郡縣所取代。劉邦更以白衣而為天子，皇權大興，凡此皆與尚同、非攻、尚賢之主張格格不入。因為墨家政治思想本是針對晚周之歷史背景而產生，其不能昌明於一統之專制天下，誠勢所必至。[38]除墨學消沉此一史實之外，漢代思想之由黃老當令轉變為儒術獨尊，亦為值得深思之問題。蕭公權認為，漢代黃老所以由養生改為治世，復由臨民以返於為我者，其根本原因仍當於歷史背景求之。中國經六國及秦楚之長期爭亂，天下困窮，達於極點，故魯儒生不肯附和叔孫通以興禮樂，文帝不納賈誼之言以改制度，可謂深合時代之需要。經惠文景三朝數十年休養生息，至武帝初年遂大臻於富庶。國力既已充裕，政策自趨積極。又適值武帝為好大喜功之主，於是黃老清靜之徒「功成身退」，儒家禮樂之術亦應運而興矣。昭宣以後，黃老漸歸隱微，至東京晚世而復成為在野之學術者，其最大之原因，則在歷史背景之轉變。[39]

蕭公權也一貫從歷史背景這個因素，解釋漢代以降中國政治思想的轉折變化。例如，他認為魏晉時代，自恣之思想所以一時盛行者自有其歷史之原因。約言之，曹魏東晉之百餘年間，乃中國社會之衰亂時期，亦為對抗禮教之反動時期。此反禮教運動與反專制之潮流匯合，遂蔚為一種以放浪人生觀為基礎之無君論。《列子》一書殆為此種背景下最重要之代表作品。[40]同樣地，他也指出，唐代儒家政論隨時世之盛衰而變化其內容。[41]這種政治思想與歷史背景相呼應之事實，在反對君權之思想發展線索中最能得之。蕭公權對於這一點有極精彩的分析，如指出，中國之專制政體肇端於秦，歷漢唐而其弊大見於世。先秦所未有之激烈反君言論，遂應衰政而迭出，漢末有王充，東晉有鮑生，晚唐則无能子。

38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281。
3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357~358。
40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402。
4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4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時代有先後，思想之主旨則不謀而大致相同。然而出世愈晚者對專制痛苦之體念愈深，所得之政治經驗較富，其言論之深切感憤亦每超邁前人。蓋李唐一朝不獨懿僖之君昏政亂，諸禍並臻，為前代所罕覯，而太宗征撫外藩，交通遠國，道佛爭長，朝野風靡，其情形亦屬僅見，无能子生當唐末，其所得之政治知識與痛苦經驗，必遠有過於鮑敬言者。其毀棄君親之言詞，遂為空前未有放膽肆情之奇謗。此由時勢所激，因果顯然。[42]在同一觀點之下，蕭公權也以時勢及思想背景之轉變，申論儒學大變於宋代之原因。[43]蕭氏對王夫之政論推崇備至，許其「就事實以立原理，通古今而權得失」。[44]蕭氏也以歷史環境之變化析論嚴復思想在民國元年前後之轉變，[45]並解釋辛亥革命所以成功之部份原因。[46]

（3：3）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期

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發展，提出兩種分期方式。第一種分期方式是依思想演變的大勢分為四大段落：[47]

（一）創造時期：自孔子降生（西曆紀元前五五一）至始皇統一（紀元前二二一）為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戰國時代，學者通稱之為先秦時代。

（二）因襲時期：自秦漢至宋元（紀元前二二一至紀元一三六七）為時約一千六百年。

（三）轉變時期：自明初至清末（一三六八至一八九八）為時約五百年。

（四）成熟時期：自三民主義之成立以迄於今。（三民主義之講演

4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460~461。
4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480。
4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677。
4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864。
46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891。
4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民國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則在　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以後居英之兩年中，即一八九六與一八九八之間。）

他接著再就中國政治思想之歷史背景，將中國政治思想史劃分為三個時期：[48]

（一）封建天下之思想：包括春秋及戰國時代，與上述之「創造時期」相當。

（二）專制天下之思想：包括秦漢至明清之二千年，與「因襲時期」及「轉變時期」之前大部份相當。

（三）近代國家之思想：包括清末戊戌維新時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與「轉變時期」之後部及「成熟時期」相當。

蕭公權認為「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變之大勢而分期。吾國政制自商周以來，凡經三變。商周之際，部落社會漸進而成封建天下，此為一變。始皇併吞六國，劃天下為郡縣，定君主專制之制，此為二變。晚清失政，民國開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終止，此為三變」，[49]依政治制度史劃分政治思想史之時期，段落分明。

四、從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脈絡看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

我們現在將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置於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論著的脈絡中加以考察。蕭氏書稿完成於一九四〇年抗戰時期的四川，一九四五年在上海正式出版。（4：1）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其資料之全面性以及論述之系統性，而與一九四五年以前所出版之各種有關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顯著之差異。（4：2）蕭著出版後，在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期、研究的方法，乃至特定論點上，對於以後出版

48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8。

4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著作均有影響。（4：3）蕭著與同時代西洋政治思想史論著，頗可互相呼應。（4：4）從1960年代以後歐美政治學界關於政治思想方法論之爭論來看，蕭著的方法論傾向有待深入考量。我們闡釋以上四點看法。

（4：1）蕭著與1945年以前中國政治思想史論著之比較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第一本以「政治思想史」為題的著作，是梁啟超（任公，1873~1929）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此書是民國十一年（1922）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梁任公在東南大學與法政專門學校授課內容，於一九二四年出版。[50]這部書雖然一如任公其他著作，才氣橫溢，但因係演講稿，內容頗為凌亂，不成體系，而且僅以先秦為研究範圍。

接著，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居重要地位，並創辦《食貨》半月刊的陶希聖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至二十五（1936）年在北平撰成《中國政治思想史》，共四冊，涵蓋時代從原始時代到明代末年，此書在一九三二年由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一九三三年在重慶南方印書館再版，民國四十三年（1954）在臺灣食貨出版社印臺灣版。陶希聖說：「我在北京大學本習法律，畢業後在各地大專學校講授親屬繼承法前後九年之久。我在這九年中間，旁及民族學，從民族學而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組織，再演進而講述中國社會史。這部政治思想史，乃是從中國歷代社會政治的演變來講解思想的演變」，[51]此書企圖從社會史立場解明政治思想史，但由於對政治思想史之內容，缺乏明確之定義，全書論述較為零散。

除了以上梁啟超與陶希聖兩家之外，一九四五年以前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論著的學者，尚有陳安仁（1932）、[52]李麥麥（1937）、[53]呂振羽

---

50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此書，1924年初版本。此書在1936及1941年均再版，現有1968年臺北之臺灣中華書局臺五版。

51 陶希聖，〈臺灣版印行記〉，《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1972、1982）。

52 陳安仁，《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臺四版、1932年初版）。在1935年《全國總書目》著錄為《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作者在本書〈序〉中說：「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37）、[54]楊幼炯（1937）、[55]劉麟生（1934）、[56]吳國禎（1928）、[57]謝无量（1923）、[58]謝扶雅（1941）[59]等各家。但通讀各書，我們可以發現各家均有所不足，有的是在時代風潮之中生吞活剝馬克思學說，硬套到中國史解釋之上；有的是取材氾濫無所歸，舉凡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故雖名為「政治思想史」，但實際上則內容至為龐雜，主題不彰。汪榮祖曾說中國政治思想「資料雖多，但散在群藉，非有明銳的觀察力與極大的耐心與勞力，難獲全豹。有些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之所以掛一漏萬，即因此故。至於在選擇工作方面，有兩重困難，一為甄別政治思想史料，不與其他思想史料相混，此有賴於對『政治思想』這一概念能確實地掌握，譬如鋪軌馳車，才有所準則。有些作者排列史料，上下幾千年，無論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種文獻少加分辨，於是猶如迷航，不知所至。」[60]這種說法完全切中蕭著出版之前許多政治思想史論著之問題，一部完整而有系統中國政治思想史正是學界一致的期待。

國已於政治哲學見長，而幾千年來政治思想的體系，竟無專家為之記述，除了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一著外，沒有發見完善的專書，不無遺憾。」（頁3）。

53 李麥麥，《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批判》（上海：新生命書局，1933），全書包括五篇論文，作者在〈序二〉中說：「這幾篇東西的性質是：前五篇是研究先秦階級鬥爭的，後一篇是研究先秦哲學鬥爭的」。

54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書局，1937；1947年上海生活書局出版增訂本），本書採唯物史觀，將政治思想視為階級鬥爭的反映。

55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書局，1937），此書涵蓋時代自上古至民國成立以來的孫中山與各派社會主義，有兩種日譯本，係古賀鶴松（東京：出版者，1940）及村田孜郎（東京：大東出版社，1940）所譯。

56 劉麟生，《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57 Kuo-cheng Wu（吳國楨），*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58 謝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59 謝扶雅，《中國政治思想史綱》（湖南藍田：1941年石印；臺灣：正中書局，1954年臺初版），作者自序云：「此書曾於民國三十年在湖南藍田之師範學院公民訓育系石印五百冊。此書研究之時代由部落時代至三民主義政治思想」。

60 汪榮祖，〈增訂版弁言〉，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頁（六）~（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是在這樣的學術史背景中，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一經出版，就獲得學界重視。相對於在蕭著之前的同類著作，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建立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輯要》（線裝六冊）的紮實基礎上，對第一手資料的掌握極具全面性，其他同類著作實難以望其項背。此書惟一的白璧之瑕就是第五編「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時期」第二十五章「孫中山」未及撰寫，僅以「本編缺文」交代，至為遺憾。除此之外，蕭著析論中國政治思想史時所展現之系統性與原創性，都使它別樹一幟而為眾所矚目。蕭公權弟子汪榮祖就指出：[61]

> （一）全書於政治思想的範疇內，上自文獻可徵之晚周，下迄辛亥革命，作極有系統的敘述與分析。二千五百餘年中，凡可述之政治思想靡有遺留，而所述論的詳略則視創獲性與影響力之大小而定，故通篇完備而勻稱。……
>
> （二）全書論及古來學者六十餘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學觀點分類徵引，並加以綜合與分析，不僅使作者之政論「暢所欲言」，而且使其意義更加明晰。……
>
> （三）全書既採歷史的方法，故對思想的時代背景特為留意。思想雖有其永久性，但政治思想必有時間性。所謂時間性乃指思想在其一時間裡的出現或實施。政治思想除理論一面外，尤有其實踐的一面，故不知歷史背景不能瞭解政治思想。從整體看，全書是在一演進的歷史間架上發展，自「創造」而「因襲」，由「因襲」而「轉變」，再由「轉變」而「成熟」，即從各個時期去了解政治思想的歷史之發展。

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出版，使「中國政治思想史」正式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學門，[62]也為後繼者奠定了研究這個學門的基礎。

（4：2）蕭著對後學之影響

61 汪榮祖，〈增訂版弁言〉，頁（七）~（八）。

62 這是汪榮祖教授在2000年11月30日提示的意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九四五年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出版以後，神州板蕩，禹域二分，蕭著對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學術界影響較大。從一九四九年以後，在臺灣地區所出版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論著，有陳啟天（1951）、[63]曾繁康（1958）、[64]萬世章與汪大華（1968）、[65]王雲五（1968~1970）、[66]薩孟武（1969）、[67]鄔昆如（1981~1982）、[68]葉祖灝（1984）、[69]張金鑑（1989）、[70]鄭昌淦（1995）、[71]孫廣德與朱浤源（1997）[72]諸家。

以上各家論述時代及重點各不相同，但是諸多論點尤其是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期，頗受蕭著之啟發。例如萬世章與汪大華合撰《中國政治思想史》，將中國政治思想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現代四期，作者明言受蕭著啟發。作者說：[73]

> 本書對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係採用歷史分期法。分為上古政治思想史，中古政治思想史，近代政治思想史，及現代政治思想史之四大時期。但此種分期法與蕭公權氏之分期法，大致相同。蓋吾人所謂「上古」時期，乃指虞、夏、殷、周至先秦以前時期而言，較蕭氏之「創造時期」提前一千餘年，即將中國政治思想之萌芽時期

63 陳啟天，《中國政治哲學概論》（臺北：華國出版社，1951）。陳啟天認為中國政治思想自漢代以後沒有發展，故不願寫「中國政治思想史」。

64 曾繁康，《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59）。

65 萬世章、汪大華，《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帕米爾書店，1968）。

66 王雲五，《先秦政治思想》、《兩漢三國政治思想》、《晉唐政治思想》、《宋元政治思想》、《明代政治思想》、《清代政治思想》、《民國與中國政治思想綜合研究》（共七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1970）。

67 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三民書局，1969年初版、1972年增訂版）。

68 鄔昆如，《中外政治哲學之比較研究》（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上冊1981、下冊1982）。

69 葉祖灝，《中國政治思想精義》（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

70 張金鑑，《中國政治思想史》（三冊）（臺北：三民書局，1989）。

71 鄭昌淦，《中國政治學說史》（臺北：文津，1995），作者為大陸學者，書則在臺灣出版。

72 孫廣德、朱浤源，《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7）。本書是空中大學的教科書，性質與其他同類著作稍有不同。

73 萬世章、汪大華，《中國政治思想史》，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概括在內。吾人所謂「中古」時期，乃指自秦漢至唐宋時期而言，約與蕭氏之「因襲時期」同。吾人所謂「近代」，乃指明清時期而言，約與蕭氏之「轉變時期」同。吾人所謂「現代」，乃指清末至今，與蕭氏之「成熟時期」同。

萬世章與汪大華明言他們的分期方式與蕭著相同，但也有沿襲蕭著之分期方式而不明言者，例如鄔昆如也將中國政治思想分為四期：[74]

一、創造期：自孔子生到秦始皇的統一中國，即有紀元前 551 年到 221 年，其間諸子百家爭鳴，各種政道和治道都有大規模的建立。

二、因襲期：自秦漢至宋元，即自紀元前 221 年至公元 1367 年，近十六個世紀的時間，都是在註釋先秦的諸家理論，尤其是設法以儒家的理想，來修、齊、治、平。

三、轉變期：自明初到清末，即自公元 1368 年至 1898 年，五個世紀期間，中國開始接觸相當不同的西洋政治思想，而自身漸漸走向轉變之路。

四、成熟期：自三民主義成立至今，即自公元 1896 年開始，直至現在。

鄔昆如的分期方式完全襲自蕭著，但並未在附註中聲明。

除了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期方式之外，蕭著諸多具體論點，對後學仍有可觀之影響，舉例言之，葉祖灝[75]、張金鑑[76]論儒家的仁與墨家兼愛之不同，均襲取蕭公權的論點。其中葉祖灝所撰《中國政治思想精義》第一章「歷史背景」、「文化背景」、「思想內容」、「地理分布」、「交互影響」、「時代先後」等六節，顯然均承自蕭著。葉祖灝是蕭公權在北京授課時的學生，他的書獻詞云：「謹以此書，紀念先師蕭公權博士，在國立大學循循善誘之教澤。」一九六九年薩孟武出版《中國政

74 鄔昆如，《中外政治哲學之比較研究》，17~18。

75 葉祖灝，《中國政治思想精義》，65。

76 張金鑑，《中國政治思想史》，698~6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思想史》，他在序言中也明言：「蕭著對余，裨益更大。」即使是標新立異的王雲五，也以蕭著作為比較之對象，王雲五說：「拙著《先秦政治思想》與《兩漢三國政治思想》兩書中，在體裁上頗異於蕭氏之作，即所論述之政治思想家，無不先摘述其有關政治之言論，然後加以論評，使客觀的資料顯現於讀者眼前，縱使個人所作論評，不免失諸主觀，仍難逃讀者之鑒衡。」[77]

除了以上所述中文著作之外，戰後日本學術界也出版少數有關中國政治思想的著作，如小島佑馬、[78]黃廷富、[79]守本順一郎、[80]岩間一雄、[81]小倉芳彥[82]以及中江丑吉[83]各家，但是都是論文集，諸作者雖然在中國古代或宋明儒學史研究領域中自成一家之言，但是上述日文著作都不是針對「中國政治思想史」而進行的系統研究，與中文學術界的同類論著如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也毫無互動。

（4：3）從同時代西洋政治思想論著之脈絡看蕭著

在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脫稿的一九四〇年之前，以英文發表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為數不少，較為重要的有Frederick Pollock、[84]William

77 王雲五，《晉唐政治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1。

78 小島佑馬，《中國の政治思想》（京都：ハーバート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1956）。

79 黃廷富，《周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井上書局，1963）。

80 守本順一郎，《東洋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未來社，1967）。本書內容研究朱子學，以及朱子學與佛教之關係等。

81 岩間一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未來社，1968）。本書研究朱子學、陸象山、元代儒教、陽明學等課題，與政治思想閱涉不深。

82 小倉芳彥，《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傳』研究ノート——》（東京：青木書局，1970）。本書主題以《左傳》為主，旁及孔、孟、荀、老、韓、董仲舒。

83 中江丑吉，《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東京：岩波書局，1950）。本書是作者之論文集，尤其以《尚書》研究為主，並非體系化之政治思想史研究。

84 Frederick Polloc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0)。此書有中譯本：張景琨，《政治思想史概論》（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初版年份不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rchibald Dunning、[85]Raymond G. Gettell、[86]Charles Howard Mcllwin、[87]George H. Sabine、[88]George Catlin[89]各家，其中Sabine是蕭公權在密蘇里大學讀學士及碩士學位時哲學系的教授，是蕭公權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引導蕭公權進入政治哲學領域。Sabine的書出版於一九三七年，當時蕭公權在「抗戰期間，僻居後方，交通梗阻，『精神糧食』的匱乏更甚於物質供應。成都各大學圖書館裡極少近年出版的西方書刊。我不免感到孤陋寡聞，學業落後的苦悶」，[90]蕭公權很可能並沒有看過Sabine的書，但Sabine將西洋政治思想史分為city-state、universal community、nation state三期，與蕭公權依「思想之歷史背景」及「政治制度」，將中國政治思想史分為封建天下、專制天下、近代國家之思想三期，[91]則可謂師生互相呼應。另外，Catlin是蕭公權在康乃爾大學時期的老師，據蕭公權說Catlin：「給與我的啟迪和鼓勵也使我畢生難忘。我寫博士論文時，他

85 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vol. 1, 1902; vol. 2, 1905; vol. 3, 1920). 此書有中譯本：謝義偉譯（上海：神州國光社）；鍾挺秀等編輯，《近世政治思想史大略》，此書翻譯原書之第三冊「從Rousseau至Spencer」部分。

86 Raymond G. Gettel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4). 此書有數種中譯本：陸國香、馮和法節譯近代部分，書名是《近代政治思想史》（1930）；戴克光有全譯本，1932年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1944年南京獨立出版社再版。

87 Charles Howard Mcllwain,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From the Greeks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 1968,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Macmillan Company, N. Y. 1932).

88 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1st ed., 1937; 4th ed. rev. by Thomas Landon Thorson (Hinsdale, Illinois: Dryden Press, 1973). 此書之中譯本狀況如下：
一、劉遐齡節譯，《西洋政治思想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
二、王兆荃譯，《西洋政治思想史》（上）（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4）。
三、劉山等譯，《政治學說史》（上下兩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1990）。
四、李少軍、尚新建譯，《西方政治思想史》（臺北：桂冠，1991）。

89 George E. G. Catlin,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New York: Tuder Publishing Co., 1939).

90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2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悉心與我研討。……1926年5月我的論文脫稿，他立即介紹到英國出版。我回國之後他繼續關心我的學業。」[92]Sabine和Catlin對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有深刻之啟示。蕭公權對Dunning等人著作也頗為熟悉，他說：「近世歐美學者輒輕視中國政治思想。例如雅勒（Janet）鄧林（Dunning）諸君，或謂中國無政治思想，或謂其淺陋零碎不足觀。非不加論述，即置諸波斯、印度及其他『古代民族』之列。一若中國之文化已成過去，而其政治思想亦應同歸澌滅也者」，[93]他對Dunning等人對中國政治思想傳統之誤解，深以為憾，成為他決心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部分原因。

從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的分期方式來看，蕭著展現一種目的論的傾向，與當時歐美政治學界的傾向互相呼應。蕭著以戊戌維新之辛亥革命為「轉變時期」，以孫中山（1866~1925）之三民主義為「成熟時期」，這種目的論、進化論的史觀，與同時的西洋學者相近。Gunnell就指出Dunning等人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與二十世紀初的意識型態之爭有密切關係。他指出，[94]Dunning、Gettell、Mcllwain通過西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來支持歐美的自由、民主、立憲等政治價值。蕭公權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視為中國政治思想的成熟作品，用以批評軍閥割據和共產黨，兩者的做法有其相近之處。[95]總之，從方法論傾向觀之，蕭著展現某種目的論傾向，並將孫中山視為中國政治思想演進的最成熟之表現，實有他個人傾向唯心論之思想背景，[96]也有其時代背景。

但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指出，蕭公權雖然深受業師Sabine的啟發，但是他在於「事實」與「價值」之關係，以及政治思想是否有其終點這

9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8。

92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62。

9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附錄：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945。

94 John G. Gunnell, *Political Theory: Trad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1979). 見王小山譯，《政治理論：傳統與闡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8、22、23、25、30~1。

95 這一點是詹康博士與我討論時提出的意見。詹博士同意我引用他的意見，謹申謝意。

96 蕭公權求學時代的康乃爾大學是唯心論重鎮，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兩點上，與其師看法並不一致。Sabine說：[97]

> 政治理論不能有終點，正如政治本身不能有終點一樣，因此政治理論的歷史沒有什麼結論。如果有一個神聖、遙遠的事件，為人類歷史的歸趨，本書的作者〔指 Sabine 本人〕不敢自命知道那個歸趨是什麼。就整個來看，政治理論簡直不能說是真的。……我們不要以為現代任何政治哲學，能夠跳出現代的問題、評價、習慣、甚至偏見的圈子，遠勝於過去的哲學。

Sabine接受休姆將「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做法，認為「價值」「只是人類對於某種社會的和有形的確實之偏好而起的反應」，也就是「無法證實的觀念」，所以將「事實」與「價值」兩者相混淆，將引起「知識上的混亂」。[98]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責任，是將「價值」、「事實」、可行性之估計等清楚劃分開來，各歸其位，史家若是企圖指出某種價值是千古不移的真理，便是濫用史筆，為他個人的主觀價值牟利。

蕭公權對政治思想史的看法，與其師大不相同。我在上文已指出，蕭公權在問學北美畢業之際對自己學業有所反省，他擬訂以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為其後工作之目標，他的理由是中國文化中「有若干觀念仍然有現代的意義。例如『民惟邦本』、『天視自我民視』、『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乃至『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遂』等，在今日任何『文明的社會』裡都可以適用」。[99]這段話表明他相信有些「價值」是永恒的，不會隨時代變動而更易。他在一九七九年春間也對前來請教的學生，表示同樣看法。[100]

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發展上的進化論、目的論看法，也與其師

---

97 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王兆荃譯，《西洋政治思想史》（上）（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4），〈原著一版序〉，頁（七）~（八）。詹康博士提示我這一段引文，謹申謝意。

98 Sabine著、王兆荃譯，《西洋政治思想史》（上），〈原著一版序〉，頁（八）。

99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70。

100 見蕭公權口述、黃俊傑筆記，〈儒學傳統與中國文化的創新〉，收入黃俊傑，《儒學傳統與中國文化的創新》，149~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為西洋政治思想史沒有終點，現代政治思想不能說是勝過既往的政治思想等看法，大相逕庭。

（4：4）蕭著的方法論問題

我在本文第三節（3：2）中說，蕭公權常常在歷史背景與脈絡中解明各家政治思想之內涵。這項判斷也獲得蕭先生本人的印可，蕭著「凡例」云：「本書體例以時代為經，以思想派別為緯，……本書採政治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略敘晚周以來二千五百年間政治思想之大概」，[101]正是他的歷史研究法的說明。

為了說明蕭著的歷史研究法，我們可以蕭公權對宋儒政治思想之評論為例加以說明。孟子政治思想中的王霸之辨是宋儒政論之重大問題，「孟子所想像湯武之仁政，既不見採納，而定一之理想轉為『暴秦』所實現。徒留一王霸問題為此後儒生爭辯之資。宋時朱熹陳亮書札來往討論至數萬言，斷斷於天理人欲之辨，竟不知孟子之尊王黜霸，尚有其歷史及政治之意義，是亦不善讀孟子之過矣。」[102]蕭公權認為：程朱之政治哲學大體上以《大學》一書為根據。表面視之，固遠承先秦儒學之正統，然就歷史背景論，則程朱之言正心修身，又與孔孟之意義有異。孔孟思想以封建宗法為對象，世卿宗子既為統治階級之重心，君長之德行自可成為維繫人心，安定社會之重要力量。秦漢以後，歷史之環境大變。千五百年間「堯舜二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此乃歷史之邏輯使然，毫不足怪。宋儒不明此理而欲障川東流，期堯舜之心傳於專制政體發展垂成之際，實為不切實用之高談。[103]諸如此類論點，均一再印證蕭公權的方法論立場傾向於在具體而特殊的歷史脈絡中考量政治思想的內涵。

正是蕭著中這種方法論傾向，使我們可以從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歐美政治學界，關於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論辯背景中，考量蕭著的優點

10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凡例〉，10。

10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100。

10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5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其限制。

關於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論，1960年代歐美政治學界有一場爭論。首先是伊斯頓（David Easton）與史特勞斯（Leo Strauss）對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歷史主義」方法展開批判，接著三位英國政治思想史學者波卡克（J. G. A. Pocock）、敦（John Dunn）與史基納（Quentin Skinner）各有撰文對研究方法提出反省。[104]根尼爾（John G. Gunnell）對這一場論辯有所檢討，他認為這場論戰涉及對於二十世紀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之性格的反省。Gunnell認為，David Easton等行為主義政治科學家主張「事實」（fact）與「價值」（value）分離，而當時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已陷入「歷史主義」的陷阱，所以唯有實證的科學研究可供為研究政治行為的唯一模式。Gunnell認為這場戰火最可能重創的是政治思想「傳統」的地位，於是有Strauss、Voegelin、Arendt等人揭竿而起，為政治思想經典辯護，主張研讀經典對融鑄一個良好的政治觀是絕對必要的。Gunnell接著將Skinner、Dunn、Pocock倡導的方法論運動，看成是因應戰後政治學界對政治思想史的敵意，而主張「非量化、非行為主義的政治科學」仍有其價值。[105]

我們在此不擬討論這一場論辯對政治學研究的意義，我們將扣緊這場論辯的方法論問題，[106]並將蕭著置於這個方法論脈絡中討論。正如楊貞德在介紹波卡克的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論時所指出的，波卡克和史基納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大抵具有兩項特色。一是採取歷史的進路，強調探討文本作者與其所出歷史情境的關係。另一是作者進行論述（discourse）的活動中心，就作者所處語言方面之語境（linguistic context），分析他

104 關於這一場政治思想史方法論的反省之介紹，參考陳思賢，〈語言與政治：關於政治思想史典籍詮釋的一些論爭〉，《政治學報》第 17 期（1989），30；Richard Tuck,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3~205.

105 John G. Gunnell, *Political Theory: Trad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4~32.

106 關於 Leo Strauss、J. G. A. Pocock、Quentin Skinner、Hans-Georg Gadamer、Sheldon Wolin 以及年鑑學派方法論的介紹，參考小笠原弘親、飯島昇藏編，《政治思想史の方法》（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選擇與使用語言的動作，以及這一動作對該語言所產生之影響。[107]史基納強調在歷史脈絡中，分析政治思想「文本」的意涵以及政治思想家的歷史地位。[108]史基納則將思想史家解析思想時的方法區分為兩種進路：一是注意文獻或典籍的宗教、政治或經濟因素等「脈絡」（context），一是在假定「文本」（text）有其自主性的前提之上，注意解析「文本」本身的意義。史基納對兩種研究進路都有批判，但他對第二種方法批判較為激烈，並對羅孚若（A. O. Lovejoy）的思想史方法論有所批評。[109]

從研究方法論觀之，蕭公權分析中國政治思想史之立場，基本上很接近波卡克和史基納的立場。蕭公權分析各家政治思想之內容前，必先說明政治思想家的身世及其時代背景，並在歷史脈絡中解讀政治思想並加以定位，這種研究方法正符合孟子（371~289B.C.）所謂「知人論世」之原則。舉例言之，蕭公權從孔孟所處時代背景之差異，解釋孔子欲君子之以德致位，孟子則以德抗位。[110]蕭公權也從歷史環境之變遷，解釋儒家與法家政治思想中君民地位之完全顛倒。[111]他也指出法家思想之「法」、「術」、「勢」觀念皆孕育於戰國之歷史環境，此種環境即「封

107 楊貞德，〈歷史、論述與「語言」分析——波卡克之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述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7：4（1997 年 12 月，臺北），151~180。

108 J. G. A. Pocock, "Political Ideas as Historical Events: Political Philosophers as Historical Actors," in Melvin Richter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9~158.

109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8:1 (1969), 3~53, esp. 11ff. 史基納以為羅孚若最大問題是在追溯單位觀念發展之時皆假定不同思想家使用相同的字眼皆指涉相同內容。他對羅氏在抽離「單位觀念」之過程中傾向於建立觀念之「理想型態」（Ideal type）一節亦頗致詰難，以為如此將不免於誤認前人思想係為後人鋪路而已。史基納由此提出研究思想家寫作時之意向（intentions）作為思想史研究之要務。史基納之方法備受 Bhikhu Parekh 及 R. N. Berki 兩氏之批評，兩氏認為作品本身乃係極複雜之思想建構，任何先驗的（a priori）假設均不能在作品與作者的意向之間建立起關係。參看 Bhikhu Parekh and R. N. Berki,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A Critique of Q. Skinner's Method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4: 2 (April ~ June 1973), 163~184。

110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97。

11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2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天下崩潰過程中之種種社會政治事實而已。就政治方面言，封建崩潰之直接結果為天子微弱，諸侯強盛。然強盛之諸侯非舊日分土之世家，而每為新興之權臣所篡奪。其幸保君位者，多不免名存實亡，成一『政由寧氏，祭則寡人』之局面。始則卿大夫侵君，繼則家臣凌主，於是昔日維繫社會之綱紀逐漸失效。且諸侯強大之事實，與攻伐兼併，互為因果。強大者致力兼併，既兼併而愈臻強大。侵略與自衛皆有待於富強。於是君權之擴張遂同時成為政治上之需要與目的，而政治思想亦趨於尊君國任法術之途徑」。[112]諸如此類例證，在蕭著中俯拾皆是，毋庸贅舉。

從上述蕭公權的方法論傾向來看，波卡克評論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時說蕭著是「古典的哲學學派」的寫作方法，只注重典籍內容，研究少數幾個主要哲學派別的互動。他認為，對蕭公權和大多數哲學史作者而言，「歷史」是典籍詮釋而已，[113]蕭著仍不能視為當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家史基納（Quentin Skinner）等人定義下的嚴謹意義的歷史論著。他認為蕭著在很多方面不是完整的歷史論著。[114]波卡克的評論，如果從波卡克所重視的語言哲學觀點而言，或許可以成立，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蕭著特重「文本」的脈絡性，強調將政治思想置於歷史脈絡中解讀，蕭公權的方法論立場實與波卡克及史基納相去不遠。

問題也許不在於：蕭公權是否是一個方法論的「脈絡主義」者（contextualist）？而是在於：蕭公權將政治思想史的「事實」（fact），與政治思想中的「價值」（value）如何安頓？[115]這個問題之所以是一個

11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242。

113 J. G. A. Pocock, "Review of K. C. Hsiao, *A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vol. 1,"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hilosophy* 13:2 (1981), 95~100.

114 同上註，尤其是頁 96 及頁 100。波卡克雖不懂中文，也不是漢學家，但曾依據英譯資料撰文討論過中國政治思想：J. G. A. Pocock, "Ritual, Language, Power: an Essay on the Apparent Political Meaning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1971〕), 42~79.

115 遠在 1940 年代，政治學者就對於政治學研究中應否介入倫理學問題，而有所爭辯。W. F. Whyte 撰文主張政治學家應專責政治問題，而將倫理問題交給哲學家。見 William Foote Whyte, "A Challenge to Political Scientist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鍵問題，乃是因為它正是實證主義與詮釋學的重大差異所在，也是「文本主義」（textualism）與「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的歧異所在，也是一九六〇年代歐美政治學界的政治思想史方法論討論的主要課題。更重要的是，「脈絡主義」的研究方法，如果持之太過，常常就會使得思想史中的「價值」問題為之晦而不彰，甚至完全摒棄不論，於是古今中外為各種專制政體辯護的政治思想，遂得以在歷史脈絡中獲得合理化之理由。

從蕭公權畢生著作看來，他雖然在方法論上傾向於在歷史脈絡中解析政治思想之內涵，但是，他不是一個極端的「脈絡主義者」。在蕭公權的學術世界中，價值關懷甚至道德關懷仍居於首出之地位。正如我過去所指出，[116]蕭公權於一九二六年撰寫博士論文就有心於從對於「政治多元論」的探索批判之中找出人類的新出路。[117]蕭公權隱約但肯定地表示了他對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和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的不滿之情。他認為，霍布士的「大巨靈」（*Leviathan*）及盧梭的公意（general will）均與個人的尊嚴與價值有牴牾之處。他對亞里斯多德及中古時代的亞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則深具好感，因為亞里斯多德的國家理論有深厚的倫理基礎，而亞奎那的政治思想則寓有高遠的宗教情操。[118]蕭公權對西洋政治思想史上諸大家的衡評月旦自有其一貫之標準，此即是道德優先性此一原則之考慮。所以，他批評二十世紀的政治多元論思想家，指出就當前世局言，我們應當賦予經濟階級更多的責任，而不是給予權力；我們應給予經濟階級更多的正面的合作的機會，而不是給予他們更

Review 37:3 (August,1943), 692~697。他的主張受到 John H. Hallowell 的駁斥，Hallowell 主張政治學家如放棄對政治現象施以價值（倫理）判斷，就形同放棄作為一個人的責任。見 John H. Hallowell, "Politics and Ethics," *The Amen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4 (August, 1944), 639~655。

116 黃俊傑，〈蕭公權與中國近代人文學術〉，119。

117 Kung-ch'üan Hsiao, *Political Pluralism*, ch. 10, 248~257.

118 Kung-ch'üan Hsiao, *Political Pluralism*, 225 f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的自主性。[119]

任何人通讀蕭公權著作，都可以感受到從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強烈的價值關懷。蕭公權論明代政治思想，很推崇明代的反專制政治思想，認為：「明代政論特點之一即為注意於民本民族之觀念，上復先秦古學，下開近世風氣。明初之劉基、方孝孺與明末清初之黃宗羲、王夫之分別代表此兩種趨勢，皆對專制天下之弊政加以嚴重之攻擊。」[120]蕭公權論十九世紀大清政府對中國鄉村之控制，亦指行政腐敗為控制瓦解之重要原因。[121]凡此種種皆顯示：蕭公權雖然強調政治思想應置於歷史脈絡中加以理解，但是他並不將政治思想化約為環境的產物，從而將價值問題從政治思想研究中抽離而出。相反地，價值關懷一直是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大特色。

五、結論

這篇論文介紹蕭公權及其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實有其特定之用意。國內政治學者黃紀等人最近說：「中國政治思想雖非當今的顯學，然而放眼國際性的政治學界，唯有臺灣與大陸兩地的政治學者最具鑽研資格，而可能在國際學界佔有一席之地，故應予以鼓勵。」[122]盱衡海峽兩岸政治學界與思想史學界，中國政治思想史仍是一個有待開發的學術領域。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雖然有其寫作時代背景的種種限制，但仍是今日我們重訪中國政治思想史領域時，最重要的學術資產之一。

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是一部「不廢江河萬古流」的著作，雖然成書於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圖書設備不足，物質條件極差，但這部書有

119 Kung-ch'üan Hsiao, *Political Pluralism*, 225 ff.

120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557。

121 Kung-ch'ü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504~505.

122 黃紀、朱雲漢、郭秋永、蕭全政、何思因，〈政治學門成就評估報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3：2（2000年10月，臺北），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蕭公權長期的學術準備工作為其憑藉，自成一家之言，問世以來，不僅對此後的同類著作深具啟發，而且時至今日仍有其重要之參考價值。

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展現某種「脈絡主義」的方法論傾向，與一九六〇年代以降歐美政治學者如波卡克與史基納的研究方法，頗有神似之處。但是，蕭公權並不因其方法論傾向，而將價值問題從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完全抽離。通貫蕭公權的所有著作，價值關懷仍是蕭公權學術世界中的核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蕭先生不僅是一個文化的折衷主義者，[123]也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折衷主義者。

*2000年11月12日初稿，2001年1月31日定稿。本文撰寫期間承詹康博士協助影印資料，並參與討論，惠我良多，謹申謝意。謹以此文奉獻於先師蕭公權先生之靈前。

（責任編輯：蔡宗憲　校對：邱昭惟）

123 蕭公權生前在華盛頓大學的同事俄國史著名學者屈萊果（Donald W. Treadgold）教授嘗稱蕭公權為「文化的折衷主義者」，其說甚是。見 Donald W. Treadgold,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Religious and Secular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vol. 1, preface, p. xiii。最近有人撰寫專著研究蕭公權的政治思想：張允起，〈蕭公權の政治思想〉（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0 年 3 月提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蕭公權著作目錄

一、書籍

1927 *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7.

1945 《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45；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1；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新一版；收入《蕭公權全集四》，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9。英文本：*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Sixth Century A.D.* Trans. F.W. Mo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China's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 Chungking and New York: China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1948 《憲政與民主》，上海：中國文化讀物社，1948；收入《蕭公權全集八》，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自由的理論與實際》，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 10 月初版。

1960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1970 汪榮祖編，《迹園文存》，臺北：環宇出版社，1970，精裝一冊。平裝二冊，第一冊《思想與學術》、第二冊《政論與時評》，臺北：大西洋，1970。

1972 《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迹園詩稿》，臺北：環宇出版社，1972。

汪榮祖編，《迹園文稿》（線裝）十卷，臺北：環宇出版社，1972。

1973 《晝夢詞》，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3。

1975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5. 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收入《蕭公權全集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1979 *Compromise in Imperial China.*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9. 陳國棟譯，〈調爭解紛——帝制時代中國社會的和解〉，收於《迹園文錄》，91~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3 《小桐陰館詩詞》，收入《蕭公權全集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楊肅獻譯，《翁同龢與戊戌維新》，收入《蕭公權全集五》，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譯自 1957 年論文）
《迹園文錄》，收入《蕭公權全集之九》，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二、論文、書評

1929 Book Review: "Heinrich Hackmann,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Munchen, 1927).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38.3 (May 1929), 262~265.

1930 〈評張士林譯賴斯基『政治典範』〉，《天津益世報・政治副刊》，1930 年 5 月 27 日。

1937 "Anarchism i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ien Hsia Monthly* 5 (Mar. 1937), 247~263.

1938 "Li Chih, an Iconoclas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ien Hsia Monthly* 6 (Apr., 1938), 317~341.

1953 "Rural Contro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12 (Feb. 1953), 173~181.

1955 Book Review: "Thomas Taylor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View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 Ethics,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tanford, 1954). *Pacific Affairs* 28.3 (Sep., 1955), 275~276.

1957 "Weng T'ung-ho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2 (Apr. 1957), 111~245. 楊肅獻譯，《翁同龢與戊戌維新》，收入《蕭公權全集五》，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Book Review: "*Hsin Ya Hsüeh Pao (The New Asia Journal)*," (Hong Kong, Feb., 195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4 (Aug. 1957), 611~612.

1958 Book Review: "Jen Yu-wen, *T'ai p'ing t'ien-kuo tein-chih t'ung-k'ao* (Studies on the Institutions of *Taiping tienkuo*)" (3 vol., Hong Kong, 195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2 (Feb., 1958), 490~491.

1959 "K'ang Yu-wei and Confucianism." *Monumenta Serica* 18 (1959), 96~212.

1960 Book Review: "Richard B. Mather (tr. and anno.), *Biography of Lü Kua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 (Nov. 1960), 101~102.

1962 "K'ang Yu-wei."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62.
Book Review: "Arthur F. Wright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196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3 (May 1962), 364~366.
Book Review: "Ch'u Chai and Winberg Chai, *The Changing Society of China*" (New York, 196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4 (Aug. 1962), 546~547.

1963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K'ang Yu-wei: An Attempt at a New Synthesis." *Monumenta Serica* 21 (1963), 129~193.
"Chinese Philosophy." *Collier's Encyclopedia*, 25:358~367, 19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ook Review: "Sybille van der Sprenkel, *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1962).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4.1 (Mar. 1963), 126~129.

"Preserv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Chinese Culture* 5.1 (June 1963), 142~150.

1964 "Le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4.2 (Feb. 1964), 108~122. 劉紀曜譯，〈法家思想與專制政體〉，收入《迹園文錄》，75~90。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Twins Shall Mee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v. 1964), 112~114.

1965 "The Case f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K'ang Yu-wei's Plan for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 *Monumenta Serica* 25 (1965), 1~83.

1967 "In and Out of Utopia: K'ang Yu-wei's Social Thought." *The Chung Chi Journal*, 7.1 (Nov. 1967), 1~18; 7.2 (May 1968), 101~149; 8.1 (Nov. 1968), 1~52.

"K'ang Yu-wei's Excursion into Science: *The Lectures on the Heavens*."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Ed. with Translation by Jung-pang Lo, Tuscon, 1967. 375~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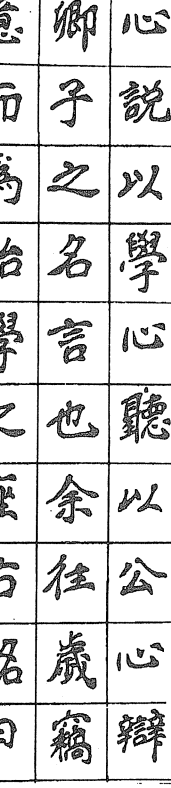
1968 "Economic Modernization: K'ang Yu-wei's Ide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onumenta Serica* 27 (1968), 1~90.

"Han Fei Tzu," "Yen Fu," "Yen Yüa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68.

1970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 K'ang Yu-wei's Proposals and their Historical Meaning."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8.1-2 (Aug. 1970), 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聯陞先生輓聯



逝園先生千古

學析法儒詩兼唐宋
德齊往哲書澤漢賢

楊聯陞敬挽

蕭先生贈牟復禮墨寶

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釋
此荀卿子之名言也余往歲竊
取其意而爲治學之座右銘曰
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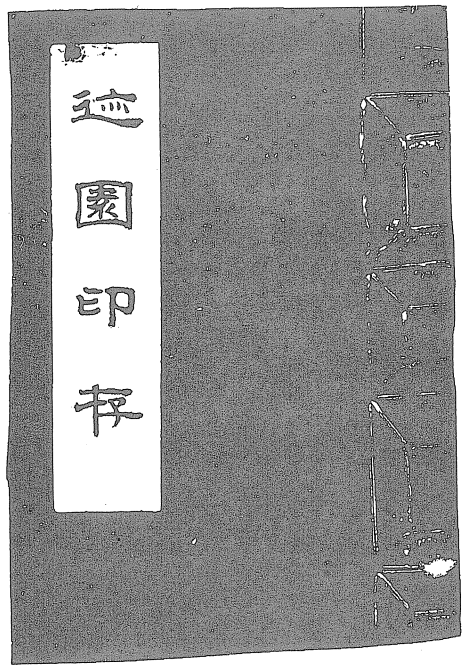
壬子初夏錄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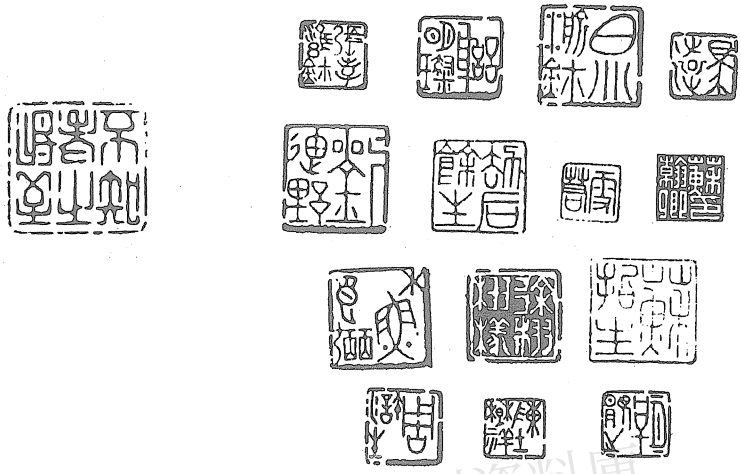
復禮教授吾兄雅屬

七十五叟 公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蕭先生治印書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siao Kung-ch'üan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Chun-chieh 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at an analysis of Hsiao Kung-ch'üan's (1897~1981)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fter sketching Hsiao's biography (section 1), we discuss the background pertaining to Hsiao's teaching career and his preparation for the writing of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published in 1945) in section 2. Section 3 delineates Hsiao's analysis of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his periodiz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Section 4 considers Hsiao's study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recounting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We conclude that Hsiao is methodologically inclined to "contextualism." However, the problem of value remains the core issue in Hsiao's world of thought.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we may say Hsiao is a syncretist in cultural and methodological senses.

Keywords: Hsiao Kung-ch'üa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contextualism, syncret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